

目 录

总序.....	v
前言.....	viii
第一章 “国家语言能力”概念与研究评述.....	1
1.1 国家语言能力.....	1
1.2 德国国家语言能力研究回顾.....	4
1.2.1 德国相关研究回顾.....	4
1.2.2 中国相关研究回顾.....	5
第二章 德国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发展历程	
(21世纪以前).....	8
2.1 1949年前德语普及与规划历史回顾.....	8
2.1.1 民族国家和德语语言的形成.....	8
2.1.2 德语语言规范的确立和协商.....	10
2.1.3 德语对外传播的开端.....	10
2.1.4 德语作为科技语言.....	11
2.2 现代德国国家语言能力建设(1949—2000年).....	12
2.2.1 两德统一前国家语言能力的发展	
(1949—1990年).....	12
2.2.2 两德统一后国家语言能力的形成和发展	
(1990—2000年).....	15
2.3 结语.....	21

第三章 当代德国国家语言治理能力建设	23
3.1 德国国家语言治理机构体系的构建	24
3.1.1 德国移民语言融入管理机构体系	24
3.1.2 德国国家外语教育事务机构体系	26
3.1.3 德语国际传播事务机构体系	28
3.2 德国国家语言规划制定与实施	33
3.2.1 德国国家外语教育规划与实施	34
3.2.2 德语国际传播规划与实施	39
3.3 德国国家语言生活研究与交流	43
3.3.1 德国国家语言生活研究	44
3.3.2 德国国家语言生活调查	47
第四章 当代德国国家语言核心能力建设	53
4.1 德国国家通用语普及	53
4.1.1 德语的法律地位	53
4.1.2 德国移民概况	55
4.1.3 针对移民的国家通用语普及的特点	56
4.1.4 小结	66
4.2 德国国家通用语规范使用	69
4.2.1 政策力	69
4.2.2 实践力	71
4.2.3 绩效力	75
4.2.4 小结	80
4.3 德国国家语言和谐生活建设	81
4.3.1 德国少数民族语言事务概况	82
4.3.2 德国少数民族语言事务发展现状	88
4.3.3 德国少数民族语言事务建设特点	124
4.3.4 挑战与思考	127
4.4 德国国家语言智能化建设	131



4.4.1 德国国家语言智能化起步的背景	132
4.4.2 德国国家语言智能化的主要成果	135
4.4.3 挑战与思考	138
第五章 当代德国国家语言战略能力建设	141
5.1 德国国家外语教育	142
5.1.1 发展现状	142
5.1.2 德国国家外语教育的特点	156
5.1.3 挑战与思考	167
5.2 德国国家通用语国际拓展	169
5.2.1 发展现状	170
5.2.2 挑战与思考	183
5.3 德国国家语言人才资源掌控	190
5.3.1 德国对内的语言人才资源掌控：人口调查	190
5.3.2 德国对外的语言人才资源掌控：翻译人才 的培养与管理	195
5.3.3 德国国家语言人才资源掌控的特点	200
5.4 德国国家对外话语表述	200
5.4.1 覆盖面	202
5.4.2 科学性	206
5.4.3 影响力	209
5.4.4 小结	213
第六章 总结与启示	215
6.1 德国国家语言治理能力特点与启示	215
6.1.1 德国国家语言治理能力特点	215
6.1.2 德国国家语言治理能力对我国的启示	219
6.2 德国国家语言核心能力特点与启示	220
6.2.1 德国国家通用语普及对我国的启示	220

6.2.2	德国国家通用语规范使用对我国的启示	222
6.2.3	德国国家语言和谐生活对我国的启示	226
6.2.4	德国国家语言智能化建设对我国的启示	236
6.3	德国国家语言战略能力特点与启示	238
6.3.1	德国国家外语教育对我国的启示	238
6.3.2	德国国家通用语国际拓展对我国的启示	243
6.3.3	德国国家语言人才资源掌控对我国的启示	250
6.3.4	德国国家对外话语表述对我国的启示	252
参考文献		258
主要法规条约		282
德国主要官方及民间机构名称		295

总序

“国家语言能力研究丛书”是2018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简称“国家语委”）重大科研项目“‘国家语言能力’内涵及提升方略研究”的系列研究成果之一。该项目是国家语委首批立项的重大科研项目，立项的背景是，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世界舞台中央，但我国的国家语言能力与综合能力不相匹配。国家语言能力是“政府运用语言处理一切与国家利益相关事务的能力”。它是国家软实力的标志，也是硬实力的支撑。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时，国家语言能力与国家军事实力发挥着同等重要的作用。国家军事实力展现的是使用“硬武器”的成效，国家语言能力展现的是使用“软武器”的成效。国家层面的外交、军事、经济、文化等各领域活动都需要强大的国家语言能力作为保障。

2016年“国家语言能力”首次写入教育部与国家语委制定的《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该规划中明确写道：“到2020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全面提升语言文字信息化水平，全面提升语言文字事业服务国家需求的能力，实现国家语言能力与综合国力相适应。”从本质上说，国家语言能力的强盛取决于国家综合国力，但国家综合国力的强大不会自动地促成国家语言能力的提升。换句话说，强国可助强语，强语可助强国，但这并不意味着强国定能强语。在目前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形势下，迫切需要我国政府加强领导，社会组织和学者群体高度关注，以形成共识，从战略层面进行规划，并采取相应措施，使我国国家语言能力与综合国力相匹配，让国家语言能

力助推综合国力，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这就是本课题的重大战略意义。

本课题组自获批“‘国家语言能力’内涵及提升方略研究”这一重大科研项目以来，深知责任重大、意义深远。本人在前期研究基础之上，提出了国家语言能力“三角理论”，即国家语言能力由三部分组成：（1）国家语言治理能力；（2）国家语言核心能力；（3）国家语言战略能力。这三个分项能力又各涵盖3—4个维度：国家语言治理能力包括治理机构体系构建、规划制定与实施、语言生活研究与交流；国家语言核心能力涉及国家通用语普及、国家通用语规范使用、国家语言智能化与国家语言和谐生活建设；国家语言战略能力则包括国家外语教育、国家通用语国际拓展、国家语言人才资源掌控和国家对外话语表述。可以看出，三个分项能力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三角形。国家语言治理能力位于顶端，指政府处理国内外两类语言事务的效力和效率，具有全局性和统领性特点，决定着核心和战略两类能力的发展方向 and 效果。国家语言核心能力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特点，是国家政治安全、领土完整、社会和谐、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信息安全等的压舱石，是国家语言战略能力发展的前提，应置于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优先位置。国家语言战略能力着眼未来，具有前瞻性和长远性特点，是国家对外开放、维护国家主权、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家国际地位的支柱，对国家语言核心能力建设有促进作用。国家语言核心能力和国家语言战略能力又反作用于国家语言治理能力的建设和发展。

在此基础上，本人和张天伟教授、杨佳博士后、董希骁教授、詹霞副教授、戴冬梅教授、李迎迎教授、邵颖副教授、张佳琛博士、董丹博士、汪波副教授等人共同努力，以国家语言能力新理论框架为依据，融合中外视角，对中国、罗马尼亚、德国、法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荷兰、意大利、韩国等国家的语言能力开展了个案式的深入调查分析。《新中国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罗马尼亚国家语言能力研究》是团队取得的首批研究成果。《新中国国家语言能力研究》全面展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以来中国政府在国家语言治理能力、国家语言核心能力和国家语言战略能力三个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彰显了中国国家语言能力的优势，同时也审视其不足之处，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设性意见。《罗马尼亚国家语言能力研究》梳理了罗马尼亚国家语言能力建设历史，并对其发展特点进行了总结和归纳，为探究中国和罗马尼亚两国在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目标、路径和模式上存在的差异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丰富的材料。除了《新中国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罗马尼亚国家语言能力研究》外，“国家语言能力研究丛书”第二批著作《德国国家语言能力研究》《法国国家语言能力研究》《俄罗斯国家语言能力研究》《马来西亚国家语言能力研究》《荷兰国家语言能力研究》《意大利国家语言能力研究》《韩国国家语言能力研究》也将陆续与读者见面。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我们希望能够为学界提供双向互动比较的内外视角，探究中国和其他国家语言能力发展体系的异同，由此借鉴外国经验，提出提升我国国家语言能力的策略，最终将我国建设成世界语言文字强国。丛书旨在抛砖引玉，期待各位专家学者不吝指教。

文秋芳

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 / 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

2021年5月1日，劳动节

前言¹

“国家语言能力”（National Language Capacity）这一概念在 20 世纪末由美国学者 R. D. Brecht 和 A. R. Walton 提出，且一经提出便显示出重要的科学价值和社会意义。2011 年经文秋芳教授引进后，国内学者就此展开了深入研究和热烈讨论。在学术界的推动下，人们逐渐认识到国家语言能力建设在国家发展战略中所发挥的重要支撑作用。作为国家语委重大科研项目“‘国家语言能力’内涵及提升方略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本书以文秋芳教授 2019 年提出的国家语言能力新理论框架为基础，对德国国家语言能力建设历程和发展现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

全书共六章。第一章系统梳理了国家语言能力的概念与国内外相关研究；第二章对 21 世纪以前的德国国家语言能力建设历程进行了简单回顾；第三至五章考察了当代德国国家语言能力的三类分项能力——国家语言治理能力、国家语言核心能力、国家语言战略能力的建设情况，总结并归纳其发展特点；第六章在此基础上对比了中德两国的国家语言能力建设，并尝试借鉴德国经验，对我国国家语言能力的进一步提升提出了相关建议。

本书从选题到最终成书均得益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文秋芳教授的学术指导，在此谨向文秋芳教授致以诚挚谢意。在本书撰写过程中，北京外国语大学张天伟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杨佳博士给予了学术指导，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研究生陈劲草细致认真地参与了全书的校对并与北京外国

1 本书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双一流”重大标志性项目“国家语言能力国际比较及理论创新”（2022SYLA001）的研究成果。



语大学硕士研究生王红照、周顾盈、王静璇在基础数据收集和资料整理方面作出了诸多贡献，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编辑团队对全文进行了严谨审校并在出版过程中给予了专业支持，在此一并致谢。最后，我们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既搜集和阅读了大量德语原文文献，也参考和借鉴了国内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可以说，本书的最终成稿离不开前人的研究，在此特别致谢！

詹霞 葛囡囡
2022年6月5日



第一章

“国家语言能力”概念与研究评述

强国必强语，强语助强国（杜占元 2017）。“国家语言能力”概念自 2011 年被引入我国学界以来，引起了诸多学者的关注，由此也诞生了一系列研究著作。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学者不仅致力于探索理论深度和凸显中国特色，也注重了解和分析其他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历史及现状，以便“借镜自画，借画自省”。

本书在文秋芳教授提出的“国家语言能力”框架下研究德国国家语言能力建设，尤其聚焦于 21 世纪以来的新变化和新趋势，以期为我国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献计献策。本章简要介绍“国家语言能力”这一概念，并对国内外关于德国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相关文献进行简单梳理。

1.1 国家语言能力

国家语言能力是国家软实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它与国家语言实力、国民语言能力以及公民个人语言能力等概念既有所区别又相互联系（张天伟 2021b）。国内学者李宇明（2011）、文秋芳等（2011）、赵世举（2015）、魏晖（2015）等先后从不同角度讨论了国家语言能力的定义及理论框架，并提出不同的分项能力，详细内容参见本系列之《新中国国家语

言能力研究》(文秋芳、杨佳 2021a)。

文秋芳于 2011 年提出“国家语言能力”理论框架,该框架经过多轮修改与完善,于 2019 年形成了新的框架。文秋芳等(2011: 5)首先在 2011 年提出“国家外语能力”这一概念,指出“国家外语能力是一个国家运用外语应对各种外语事件的能力”,它区别于公民(国民)个人语言能力和社会语言能力,强调国家在语言战略层面上的重要作用。随着研究的深入,文秋芳(2016b: 26)经过深入的思考正式提出了“国家语言能力”的概念并将其解读为“政府处理海内外涉及国家战略利益事务所需的语言能力”。从定义来看,此时的“国家语言能力”已不再限于外语,而是将用于处理国内外事务所需的语言能力都囊括在内,既“对外”,也“对内”。同时,文秋芳(2016b)列出五个分项能力:管理能力、掌控能力、创造能力、开发能力和拓展能力,还创新地为每个分项能力设定 2—4 个评价指标。2017 年,基于前述研究与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 *Lingue/Parole* 观点以及乔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提出的 *Competence/Performance* 观点,文秋芳(2017)将国家语言能力视为一个双层结构,划分为国家语言资源能力和国家话语能力。虽然这一理论框架在当时已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性,但也有明显的局限性:第一,它未将国家语言资源能力和国家话语能力整合在统一框架内;第二,该框架缺少双向研究,未能站在中国视角看待世界问题(文秋芳、杨佳 2021a)。因此,文秋芳、杨佳(2021a: 5)融合了“从外国看中国”和“从中国看外国”的内外视角,把国家语言资源能力和国家话语能力整合在同一个框架内,并将国家语言能力重新定义为“政府运用语言处理一切与国家利益相关事务的能力”。在这一概念中,执行国家语言能力的主体是政府;处理语言事务的范围既包括国内也包括国外;相关事务必然涉及国家利益,而非个人或某个群体;处理所有事务的手段必须是语言。文秋芳(2019a)以及文秋芳、杨佳(2021a)围绕这一概念确定了国家语言能力的框架(见图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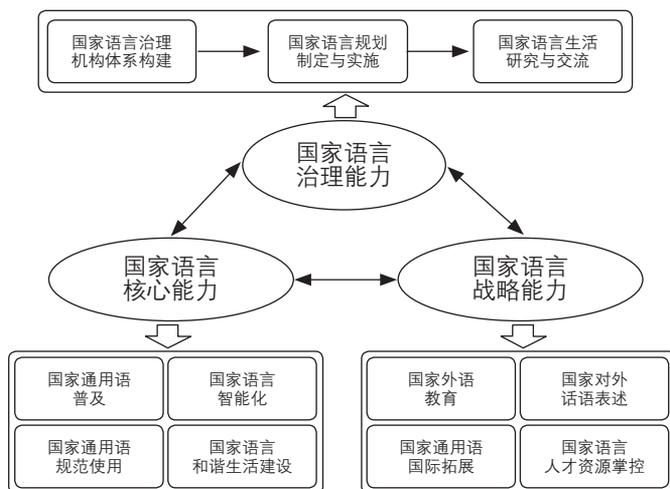


图 1.1 国家语言能力构成新框架（参考文秋芳 2019a）

如图 1.1 所示，国家语言能力包括三部分：国家语言治理能力、国家语言核心能力和国家语言战略能力，三者形成一个稳定的三角形。其中国家语言治理能力位于顶端，具有全局性和统领性的特点，调控核心和战略两类能力的发展走向；国家语言核心能力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的特点，处于优先发展位置；国家语言战略能力着眼未来，具有前瞻性和长远性的特点（文秋芳 2019a；文秋芳、杨佳 2021a）。上述三个分项能力分别涵盖 3—4 个维度，每个维度又包括若干方面。此外，文秋芳（2019a）以及文秋芳、杨佳（2021a）还强调，虽然国家语言能力的三类分项能力相对稳定，但每个分项能力的维度都具有“开放性”和“动态性”。

这一国家语言能力新框架的整体动态性和发展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为不同国家的语言能力研究提供了可依据的理论框架，本书便是基于该理论框架的研究成果之一；第二，不少学者基于这一框架继续探索，根据国家需求完善国家语言能力指数体系并开展了研究实践（张天伟 2021b）。在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的带动下，国防语言能力研究、国家翻译能力研究等也成为近年研究热点（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2020；任文、李娟娟 2021）。

1.2 德国国家语言能力研究回顾

1.2.1 德国相关研究回顾

“国家语言能力”的概念最早于1993年由美国学者理查德·布雷赫特 (Richard D. Brecht) 和 A. 罗纳德·沃尔顿 (A. Ronald Walton) 提出 (Brecht & Walton 1993), 随后一些美国学者开展了相关研究 (Brecht & Rivers 1999, 2005, 2012; Jackson & Malone 2009; Murphy & Evans-Romaine 2016)。这一概念在2011年引入中国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创新, 相关研究层出不穷。与之相比, 德国学界至今尚未采用这一概念, 研究者们仍沿用传统的“语言政策”“语言规划”或“语言管理”的说法。“语言政策”这一概念被普遍接受和应用, 而它其实对应着两个不同的德语表达: Sprachpolitik 和 Sprachenpolitik。这源于德国的科学传统, 前者针对对一种语言的政策措施, 而后者强调如何处理不同语言之间的关系 (Marten 2016)。从实际情况来看, 一个国家采取的语言政策往往包括了这两个方面。德语学界目前也越来越主动接纳英语概念 language policy, 并趋向于使用 Sprachpolitik 一词概括原本两个德语词的内涵, 本书所探讨的“国家语言能力”本质上也包括这两个方面。由于德语学界的学术传统及习惯, 本章将从语言政策的视角介绍德国语言能力研究的现状。

德国早期语言政策的重点是德语的规范和普及, 基本上聚焦于正字法、语法和词汇的标准化, 也就是狭义的语言政策。在德国语言发展史上, 纳粹政党曾在其执政期间有意识地通过政治势力影响语言及语言使用, 例如选择符合宣传目的的词汇或者将一些外来词德语化。这一政策的影响非常深远, 以至于二战后的德国历届政府均不敢显性强调语言政策。这一情况也延续到德国学界。

随着语言学的发展和英美学界的影响, 德国学界对于语言政策的研究视角愈加丰富, 语言与社会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随后逐渐被纳入语言政策的研究范围中。在理论方面, 德国学者借鉴了其他国家学者提出的概念 (Haugen 1972; Haarmann 1986; Lo Bianco 2005; Hornberger 2006), 并



结合了德国的研究传统，形成了综合性的话语规划研究框架，强调要从语言和社会两个层面探讨一个国家的语言政策（Marten 2016）（见图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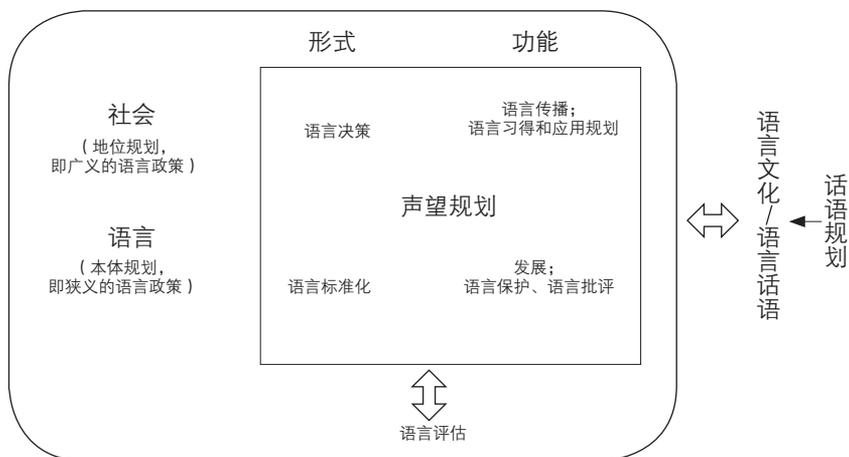


图 1.2 德国学者海科·马滕的语言政策研究框架（参见 Marten 2016 : 27）

具体到细分领域，德国不少学者关注了德语的方方面面，其中以乌尔里希·阿蒙（Ulrich Ammon）的研究最全面、影响最广，他的多本专著分别关注了德语的国际地位（Ammon 1991, 2015a, 2019）、德语在不同德语国家的变体（Ammon 1995）等。海科·马滕（Heiko F. Marten）也在其专著中探讨了德国少数民族语言、语言教育、媒体语言使用、语言多样性等方面的语言政策（Marten 2016）；此外他也关注了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语言政策，例如他曾以卢森堡和比利时为例探讨了欧洲国家的多语性，并研究了英格兰和爱尔兰的语言政策、北欧的语言政策等。

1.2.2 中国相关研究回顾

与回顾德国研究现状的思路相同，本节从广义的概念出发探讨德国国家语言能力在我国的研究现状。中国学者系统探讨德国的语言政策大约开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关注的主题也多是语言的规范化和标准化（长晨 1993a）以及多年来备受学界关注的正字法改革（冯志伟 1992；何涛

1998)。进入 21 世纪后，我国学者对德国国家语言能力的发展更为重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得到扩展。总的来说，过去二十年，中国对德国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相关研究呈现出如下特点。

首先，全面、系统地针对德国国家语言能力的研究尚不多，只有陈杭柱（2000）、陈晓春（2005）先后回顾了德语的普及和规划史，然而这两项研究并未覆盖语言能力研究的所有方面，并且出版距今已有多年，缺少德国该领域最新的发展情况。

其次，进入 21 世纪后，中国学界对德国国家语言能力的关注呈现出逐渐增长的趋势，在 2016 年后尤为突出。2016 年，“国家语言能力”首次写入教育部与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简称“国家语委”）制定的《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¹《中国外语》《云南师范大学学报》《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等学术期刊专门开辟了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的专栏。同时，越来越多德国相关研究都采用国家语言能力框架作为理论框架（葛囡囡 2020；张海 2020），这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学者的中国情怀、国际视野和责任担当。

再次，国家语言能力框架覆盖面广，而中国学者对于德国的研究焦点基本上是与中国相关的内容，包括德国的语言文化对外传播政策及其主要执行机构歌德学院（张帆、王红梅 2006；王志强、王爱珊 2014；柏悦 2016；杨娜 2016；缪雨露 2017；蔡翠红、黄子玲 2019）、德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张建伟、王克非 2009；王淑杰 2011；葛囡囡 2020；黄崇岭 2021；张天伟 2021a）。德国难民潮爆发后，开始有学者探究德国的移民语言融入政策（李媛、李心驰 2020；张海 2020）、少数民族语言政策（李永村 2020；郭瀚 2021b）。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还有学者开始关注德国网络语言的生态性（李凤琴、陈刚 2021）。

最后，我国自 2016 年开始出版黄皮书《世界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主要介绍当前美国、法国、英国、德国等国家和其他国际组织的语言生

1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8/s3127/s7072/201609/t20160913_281022.html（2022 年 6 月 23 日读取）。



活中发生的重要事件和热点问题（文秋芳 2019b）。黄皮书中与德国相关的主题有正字法改革（许一诺等 2020）、歌德学院（郭瀚 2019, 2020, 2021a）、德国年度词汇（张申威 2020；张申威、钟芊 2021）和移民语言政策（李媛、李心驰 2020）。这些研究展示了德国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最新成果，对我国的语言生活决策具有借鉴意义。尽管如此，黄皮书选取的热点并不能呈现德国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全貌。

德语是世界上最主要的语言之一，截至 2022 年 1 月，世界范围内有大约 1.3 亿人将德语作为母语，还有大约 1540 万人将德语作为外语学习，大约 750 万人是讲德语的少数民族。¹ 德语也是全球最重要的国际组织之一——欧盟的工作语言；与此同时，德国作为世界强国之一和欧盟的重要成员国，在全球各个领域发挥的作用更不可小觑。有鉴于此，全面、系统地梳理德国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历史和现状有助于我们掌握有价值的一手资料，为我国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1 信息来源：<https://de.statista.com/statistik/daten/studie/1119851/umfrage/deutschsprachige-menschen-weltweit/>（2022 年 6 月 23 日读取）。



第二章

德国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 发展历程（21 世纪以前）

知往鉴今，德国现今国家语言能力表现离不开其发展历史，因此本章旨在从德国国家通用语，即德语的形成、规范、普及和国际拓展等方面简单回顾 21 世纪之前德国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发展历程。

2.1 1949 年前德语普及与规划历史回顾

德意志民族最初的语言形成于中世纪早期，但同时存在各不相同的地方方言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文学语言。此后，德语语言先后受到法语、荷兰语、拉丁语等其他语言影响，普通民众因社会经济条件限制而将方言作为主要交际语言，这些都导致德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没有形成统一的德语语言。直到 16 世纪，德语语言才开始统一。

2.1.1 民族国家和德语语言的形成

2.1.1.1 马丁·路德与统一的德语语言

民族国家的诞生和统一的德语语言的形成可谓相辅相成，在这一过程中，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功不可没。路德本着通俗明了的原则，采用当时较为普遍的萨克森官方语和图林根地方语，兼收德意志中、东部



和中南部地方语言中的精华，把圣经译为一种由他才确定下来并通用起来的人民语言的版本（徐良利 1994）。1522 年 9 月，《新约全书》德译版出版后迅速热销全国，从此德语逐渐成为圣经语言、教会做礼拜的语言和宗教辩论的语言，唤醒了民众心中的母语意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农民战争的爆发。在当时四分五裂的德意志土地上，路德的“统一德语”成为维系德意志各城乡和邦国的纽带，成为德意志民族构成的重要因素，推动了德意志民族形成的进程（陈晓春 2005）。

2.1.1.2 致力于纯洁德语的语言协会

德语的统一或“纯洁”历来不是通过强制力量实现的。早在 17 世纪，德国民间，特别是受教育的群体就开始展开行动，致力于德语的规范化，这首先体现为 17 世纪成立的为数众多的语言协会。在这些协会中，1617 年成立于魏玛的“丰收协会”¹ 是德国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语言协会。这些协会的共同目标是在国家尚未统一、经济发展滞后的情况下，阻止德语受外来语的进一步影响以及为制定德语语言标准作出自己的贡献。

2.1.1.3 德意志帝国与德语标准化

19 世纪五六十年代，德国的工业化进程继续深入，内河航行、铁路和道路交通等高速发展，贸易频繁，新闻媒体出现。1871 年德意志帝国的建立标志着德意志民族的统一，也是德语语言统一的重要历史节点，因为已经集中统一的邮政和通信部门、铁道部门、法律部门、教育和管理部

1 本书后附录中外对照的“德国主要官方及民间机构名称”，故正文中出现此类信息时不再标注德语全名。

2.1.2 德语语言规范的确立和协商

1800年前后，标准语言和民族文化的发展已告一段落，但德语正字法仍然没有得到统一。早在16世纪初，人们就已经有了规范德语正字法的要求。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国家、城市和学校都在寻求解决方法。1857年的汉诺威会议和莱比锡会议、1861年的斯图加特会议以及1871年的柏林会议，都分别制定过“德语正字法的规则和词汇表”。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后，各界要求制定正字法规则的呼声日益高涨。1876年，普鲁士文化部在柏林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正字法会议，该会议为1901年统一正字法提供了文字资料，奠定了第一步改革的基础。直到今天，德语区的正字法会议及其确定的正字法改革仍在影响着德语的规范化。

被誉为“德语正字法之父”的康拉德·杜登（Konrad Duden）1880年编写了《德语正字法大词典》（*Vollständiges orthographisches Wörterbuch der deutschen Sprache*），由莱比锡文献目录出版社出版。同年这部词典被普鲁士王国宣布为德语拼写的工具书，成为德语区最受欢迎、最权威的德语正字法词典，为统一正字法奠定了基础。因此，这部正字法词典也被视为德语书写规范化的一个重要开端。

1901年，第二次正字法会议在柏林举行，会议上通过了有“日耳曼语言学之父”之称的雅各布·格林（Jacob Grimm）生前的提议，决定使用拉丁字母进行拼写，该会议公布的拼写规则具有官方地位，一直沿用到1998年。这一次改革的目的在于统一德国南北方及奥地利、瑞士的德语书写规则，它虽然在当时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因为是各方妥协的产物，不仅稍显简单，也损害了德语书写的系统性。当时参会的杜登在1902年将这次会议的决议写入《德语正字法大词典》，这本词典是德语正字法的基础。

2.1.3 德语对外传播的开端

在德语完成了其作为民族国家精神支柱的使命后，自魏玛共和国起，德语的对外传播日益受到关注。1920年，魏玛共和国外交部成立了独立的



文化处。1925 年，歌德学院的前身——德意志学会成立。该学会最初的目标人群是在国外生活的德国人，但从 1926 年起开始建设向外国人提供的德语课程；自 1929 年秋开始，其对外工作的重点转变为在国外设立德语语言培训班；1930 年，该学会开始获得德国外交部的资金支持。1932 年是德国最伟大诗人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逝世一百周年，该学会在慕尼黑新设了一个专门定期培训德语教师的下属机构，该机构因此被命名为歌德学院。当时官方明确指出，歌德学院的定位是服务于德语教学的机构，旨在加强外国对德语的认识和理解，而并非渗透、宣传。这一时期歌德学院的主要业务范围仍在德国国内，尚未在国外建立分支机构（柏悦 2016）。

非常讽刺的是，歌德学院向海外拓展开始于纳粹政府时期，此时歌德学院及其上属机构德意志学会都被迫沦为官方喉舌。1934 年，时任国家元首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发表了“文化演讲”（Kulturrede），语言被他视为权力政治的宣传工具。1941 年，德意志学会被划归到臭名昭著的宣传部之下，德意志学会和歌德学院从而获得纳粹政府的资助。在此阶段，歌德学院的影响力已超出德国；截至 1943 年 10 月，歌德学院分校几乎遍布整个欧洲，甚至还远及阿根廷和中国。二战结束后，鉴于它与纳粹组织的密切联系，歌德学院被认定为纳粹机构而遭到解散（柏悦 2016）。

2.1.4 德语作为科技语言

进入工业社会后，伴随着德国科技的迅猛发展，德语一度被公认为世界科技语言，因此德语也在世界范围得到一定程度的拓展和发展。1898 年创刊于日本的某德语杂志在其创刊号上这样写道：“德国赢得了在科学方面最发达国家的声誉，这是当之无愧的……所有派往德国作调查的人都认为，德国的发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科技进步的缘故，因此学习德国语言，是会受益匪浅的。”（转引自陈晓春 1996：65）德国的科技出版物数量曾经一度超过英语科技出版物，1890 至 1930 年间，德语作为科技语言在世界上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不过，受国内外因素的影响，德语后来在与英语较量科技语言的竞争中落败（陈晓春 1996）。

由上可知，德语语言的形成和规范是一场自下而上的行动，这是德国民众、知识分子和民间协会自主选择及共同努力的结果。唯一例外的是纳粹政府时期推行的语言专制主义，当时的帝国新闻社出于政治目的硬性规定和推行词语的用法。例如，该新闻社 1937 年宣布“废除”Völkerbund（国际联盟）一词，借以反对在当时起进步作用的该组织；1939 年又宣布 tapfer（勇敢的）一词只能与 Deutsch（德意志）一词搭配使用，借以表示只有德意志民族才是“勇敢”的。然而，这些所谓的“语言规范”完全没有群众基础，最终完全无法推行（冯志伟 1992）。相对而言，德语的对外传播离不开背后的政治力量，歌德学院的成立和发展演变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充分体现了魏玛共和国时期文化语言政策的前瞻性。两德统一后，特别是 21 世纪以来，歌德学院又重新承担起对外传播德国文化的重要使命，成为当代德国的“形象大使”。关于这一部分，本书的第四章将有更加详细的介绍。

2.2 现代德国国家语言能力建设（1949—2000 年）

2.2.1 两德统一前国家语言能力的发展（1949—1990 年）

二战后的民主德国（下文简称“东德”）和联邦德国（下文简称“西德”）是德国近现代史上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二者同宗同源，德语在本质上并非发生“分化”¹。然而东德和西德内部错综复杂，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激烈，必然对语言交际、语言标准和语言系统产生影响。

2.2.1.1 德语的不同政治变体和语言规范

与一般的地域方言或语言的社会变体不同，东德和西德的语言属于不同的政治变体，是两个国家的官方语言形式，很多表达也是这两个国家作

1 在两德统一后举行的第一次全德语言学者大会上，原联邦教育部部长于尔根·默勒曼（Jürgen Möllemann）表示，四十年的分裂留给德国人民的“最大幸事莫过于德语没有分化”。



为语言社团的共同语和规范语，具有一定的规定性，甚至强制性效力（见表 2.1）。

表 2.1 西德、东德不同语言规范示例（参考长晨 1993b：28-29）

西德	东德
Ost-Berlin 东柏林	Demokratischer Sektor von Berlin 柏林的民主区
Zonengrenze 占领区界	Staatsgrenze West 共和国西部边界
Parlament 议会；Bundestag 联邦议院； Bundesrat 联邦参议院	Volkskammer 人民议院
Bundeswehr 联邦国防军	Volksarmee 人民军
Satellit 卫星	Sputnik 卫星
Astronauten 宇航员	Kosmonauten 宇航员

正是由于社会政治的原因，相同职能的机构和组织被赋予了完全不同的名称，甚至有时用完全不同的方式为同一事物命名。

2.2.1.2 《杜登词典》的两个版本

东西德国语言的差异表现在日常语言使用中，据 1982 年的一项统计，东西德国有大约 24,000 个意义不同的词汇。这些差异也反映在东德与西德分别编纂的《杜登词典》上。东德莱比锡文献目录出版社出版的《杜登词典》遵从东德政府的政策和路线，西德曼海姆文献目录出版社也出版和更新了《杜登词典》。按照日耳曼学研究者维尔纳·赫尔曼（Werner M. Hellmann）的说法，东德的《杜登词典》比同一时期的西德《杜登词典》少收录了 400 余词，而很多词由于具有特定的政治色彩被收录或被赋予了与西德完全不同的解释。¹两个版本的《杜登词典》既反映也影响着两个政府和民众的语言使用，展现了真实的德语使用情况，反映了客观的社会变化。

¹ 详见：<https://www.mdr.de/zeitreise/rechtschreibreform-112.html>（2021 年 10 月 18 日读取）。

2.2.1.3 延续的正字法改革

在这一时期，由西德倡议，德语国家再次掀起了正字法改革的热潮。1954年，西德提出了“斯图加特方案”（Stuttgarter Empfehlungen），后经修改成为“威斯巴登方案”（Wiesbadener Empfehlungen），它也是德语国家各种正字法改革方案的基础。尽管在西德，作家、学者、中小学教师、社会民主党以及《杜登词典》编辑部的编辑人员支持正字法，但右翼政党的一些政治家和出版社对此持反对意见。这次正字法改革在同样使用德语的奥地利和瑞士也遭遇了困难，两国均持反对态度。

这一时期，正字法改革还经历了几次大事件：

1980年，东西德及瑞士和奥地利共同出面，组建了“国际正字法工作组”，正式开启了德语正字法改革的国际协作。

1986年和1990年，奥地利牵头组织了正字法改革的第一次和第二次维也纳会议，会上确立了德国、奥地利、瑞士正字法工作组的阶段性工作进程。

1988年，联邦各州文化教育部长联席会议¹委托莱布尼茨德国语言研究所正式组建了德语正字法改革工作组。

正字法改革一直到1998年才暂时落下帷幕，后文将继续介绍相关内容。

2.2.1.4 西德与东德的德语推广机构

1951年，歌德学院在西德重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歌德学院主要承担语言教学机构的职责，它通过德语语言班和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推动德语进一步传播。1960年，西德外交部决定将所有对外文化机构和绝大多数的文化计划交由歌德学院管理和执行。歌德学院因此成为西德最大的对外交流机构，致力于多边文化的沟通交流。

1 联邦各州文化教育部长联席会议为本书重要参引信息来源。本书数字、信息除特别注明外，联邦各州文化教育部长联席会议公布的所有文件均来自其官网：www.kmk.org（2019年12月1日读取）。德文资料均由本书作者译为中文。



与此同时，东德也建立了与歌德学院相抗衡的语言和文化传播机构。1953年，东德的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设立了与歌德学院相抗衡的哥特弗雷德·赫尔德¹学院（下文简称“赫尔德学院”）。赫尔德学院也开设语言班，到1983年已经有来自120多个国家的15,000名留学生在赫尔德学院学习德语。

两德统一后，歌德学院在1990年开始接管赫尔德学院，并进行新的人员分配。

这一时期，两个国家使用共同的语言——德语，双方在德语的规范化问题上既有分歧，也有合作。他们之间的分歧主要体现在部分词汇的使用和《杜登词典》的编纂上；在正字法改革这一主题上，二者虽然态度有所不同，但总体上仍然协同合作。在德语的对外传播方面，东西德国分别重建和成立了学术机构，尽管各有其政治目的，但客观上都促进了德语语言和德国文化在国际上的传播及推广。

2.2.2 两德统一后国家语言能力的形成和发展（1990—2000年）

两德统一是20世纪90年代一件震撼世界的大事，德国社会急剧变化，这也必然反映在德语语言以及德国的语言政策上，其中德语的规范化首先表现在语言称谓危机上。

2.2.2.1 语言称谓危机

通用语的规范化，特别是语言称谓危机（Bezeichnungsnot）是新联邦政府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例如：如何称呼统一前的“民主德国”地区？如何称呼原来的“联邦德国”？如何称呼统一且扩大了了的“联邦德国”？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

德国政府和德国语言协会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出面干预，采取了一系列举措。首先，德国语言协会针对当时冲突最大的问题，发起“有奖

1 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是德国著名的哲学家、语言学家。

征名”活动，让感兴趣的德国人以投票的方式选出统一后的东部地区的称谓。1991年，“新加入的五个联邦州”（fünf neue Bundesländer）被选为最佳提案，但在一般场合可使用“新联邦州”（neue Bundesländer）、“新五州”（Neufünfland）等其他表达。接下来，联邦内政与国土安全部¹成立专门工作组，研究并寻找“在法律和语言上都正确”的德国国名称谓；1991年6月，该工作组提出了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方案。该方案所规定的正式场合下的表达如下表所示：

表 2.2 1991 年提出的国名称谓（参考长晨 1993a）

中文译名	德语名
统一前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nach dem Gebietsstand bis zum 3. Oktober 1990
统一前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ehemalige 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ehemalige DDR
统一后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nach dem Gebietsstand seit dem 3. Oktober 1990

通过法律形式确定德语表达，这在德国历史上是鲜有的。然而，这些通过法律形式确定并由德国语言协会向社会推荐的名称并没有完全被民众接受（长晨 1993a）。

2.2.2.2 统一后的正字法改革

伴随着德国统一，1991年《统一杜登词典》的出版要求结束了自二战以来的东西两个杜登的局面，同时也使东西德各自制定标准的做法成为历史。此后，统一后的德国从政府层面更有力地推动和推广正字法改革（见表 2.3）。

1 本书收集资料过程中，该机构名称为“联邦内政、建设和家园部”（Bundesministerium des Innern, für Bau und Heimat），后于 2021 年 12 月 8 日更名为“联邦内政与国土安全部”（Bundesministerium des Innern und für Heimat）。为保证文献信息标识正确，全书涉及该机构的参考文献仍沿用其旧称 Bundesministerium des Innern, für Bau und Heimat。另外，全书涉及的德国机构名称均依据 2019—2021 年本书撰写时参考的德语文献或官网资料而来，在本书出版过程中有些机构信息发生变化，具体情况请以各机构官网数据为准，笔者无法实时追踪更新，特此说明。



表 2.3 统一后德国推动正字法改革大事记（参考何涛 1998）

时间	事件
1991 年	组建了德国正字法改革主管官员工作组，由各州选派一名代表参加。
1995 年	1994 年维也纳会议后，德国在 16 个联邦州 ¹ 提交了正字法新规则的提案，该提案在 1995 年通过。
1995 年	巴伐利亚、巴登-符腾堡等州率先在小学教授正字法。
1996 年	第一本采用新规则的词典——《杜登词典》第 21 版问世，学校可以从 1997/1998 学年开始在 1 年级教授新规则。
1997 年	德国 90% 以上的小学，巴伐利亚州、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等地半数以上的文理中学开设了新正字法课。
1998 年	新规则在学校强制施行。

正字法改革虽然在官方层面上推动很快，但在民间却遭到来自作家、新闻工作者、出版商、教师和法律人士的反。1996 至 1998 年间，反对的呼声达到顶峰，出现了三次引人注目的抗议事件：法理之争、公民抗议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全民公决（赵守辉、尚国文 2014）。尽管如此，这些反对声音并未阻止正字法改革工作继续进行。进入 21 世纪后，作为后续机构的德语正字法委员会成立，重新修订后的新正字法也在 2006 年正式施行。详细情况参见第四章。

2.2.2.3 统一后德国的少数民族语言政策

与法国“先有政治共同体，然后才有民族文化意识”的路径不同，德国在 19 世纪以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更优先强调同一政治共同体内成员共有的语言、文化、历史和血统的起源（黄柯劼 2018）。这一情况随着二战和东西德分裂的历史而改变。对于德国的少数民族而言，国家认同更多由战后的宪法决定，因此德国对民族认同、民族语言和文化的保护相对宽容。

¹ 统一后的联邦德国共有 16 个联邦州，其中有 3 个城市州，分别是柏林、汉堡和不来梅，其地位类似中国的直辖市。

特别是在这一时期，欧洲委员会于1992年签署通过了《欧洲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宪章》¹（下文简称“《语言宪章》”），1995年通过了《欧洲少数民族保护框架公约》（下文简称“《保护公约》”），这两个文件对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少数民族影响巨大。德国在1998年通过《语言宪章》时指定了四种语言作为《语言宪章》意义上的少数民族语言，即丹麦语（Dänisch）、弗里西语（Friesisch）、索布语（Sorbisch）和罗姆语（Romanes）。德国还根据《保护公约》精神保障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权利，例如在少数民族的聚居区用双语表示地名、街道名；小学要用少数民族语言进行教学等（李永村 2020）。在德国，少数民族语言政策是由各联邦州制定并实施的，保护和促进少数民族语言作为一种文化责任，主要也由各联邦州和地方政府负责，因此各州在制定和执行具体政策时有所差别。例如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公立学校和个别少数民族学校都提供用弗里西语讲授的课程，位于布雷德施泰特的北弗里西语研究所成立于1965年，是研究、保护和传承弗里西语及文化的核心科研机构。

德国的少数民族语言数量不多，但每种语言的历史、维护和传承的情况大相径庭。近年来，德国各级政府出台了少数民族语言保护的新政，为此也拨付大量资金。详细内容见第四章。

2.2.2.4 统一后德语的国际拓展

统一后的德国在德语的国际拓展上更加积极主动。在二战后至两德统一的时间里，德国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不敢大张旗鼓地向外推广德语；（西德的）联邦制政体也决定了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化管辖权不属于联邦，而是由各州负责，这就导致即便制定了统一口径的国家语言政策，也缺少强有力地对外推广德语的国家机构。因此，德国人，特别是政界人士和国际组织的官员语言意识不足。两德统一赋予了德国新的契机，让德国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语言政策。

1 本书后附录中外对照的“主要法规条约”，故正文中引述和介绍法规条约时不再标注其德语名称。



这一时期，德语的国际拓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争取在国际组织（包括欧盟）中的语言地位以及依托歌德学院加强国际传播。

争取德语在欧盟中的语言地位

二战后的几十年间，欧洲一体化进程从最初成立纯粹功能型的煤钢联盟发展为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层面的组织联盟，欧盟也在 20 世纪 90 年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地区联盟之一，同时还继续新增成员国。对德国而言，欧盟是最为重要的国际组织，这不仅因为德国人口在欧盟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最大，作为欧盟经济的火车头，德国缴纳的经费最多，更是因为冷战结束和德国重新统一意味着德国走出了在政治大国夹缝中生存的窘境，它开始被视为正在崛起的欧洲的中心力量（于芳 2018）。

然而在当时，德语在欧盟这一组织中的使用 and 地位与德国在欧盟的地位完全不符。虽然 1958 年颁布的欧共体一号语言章程规定了欧盟内所有成员国的语言都是平等的官方语言和工作语言，但英语和法语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作语言，欧盟各国为各自语言的地位仍然争论不休，德国（同时也包括奥地利和个别东欧国家）政府提高德语地位的努力尤其受到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牵制（伍慧萍 2003）。有鉴于此，德国经济界首先传出提升德语地位的呼声，因为德语在欧盟内部屈居于英语和法语之下，不利于德国企业的竞争，随后媒体也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并批判德国失败的语言政策。在经济界和媒体的推动下，德国政府对于在国际机构中提高德语地位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并制定了相应的行动计划。事实上，这一行动还要稍早于两德统一（见表 2.4）。

表 2.4 德国政府在欧盟中争取语言地位的大事年表（1986—2000 年）

（参考伍慧萍 2003）

时间	事件
1986 年	联邦德国政府的公告指明，“德国语言政策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在国际和超国家组织和国际会议中贯彻德语作为官方语和工作语”。
1989 年	联邦德国经济部长赫尔穆特·豪斯曼（Helmut Haussmann）访问布鲁塞尔时，要求“德语作为法语和英语之外的第三工作语”。

（续下表）

(接上表)

时间	事件
1992年	德国的欧盟一体化状况报告指明，德国政府改变策略，放弃法律地位平等的理由，选择了务实和实用主义的态度，也就是放弃了官方语的说法，并明确提出确立德语作为英语和法语以外第三种工作语的目标。
1993年	联邦议院的会议中明确指出，“联邦议院历来高度重视德语在欧共体机构中作为平等的官方语和工作语……联邦议院今后也将坚决抵制一切歧视德语的行为”。
1994年	德国外交部拨款，歌德学院有针对性地为欧盟官员开设德语语言课。 ¹
1995年	各联邦州欧洲部长维尔茨堡会议决议，针对德语在欧盟的使用提交了声明，强调了将在欧盟机构各环节中放弃使用翻译而使用德语作为工作语的目标，并要求检查欧盟机构在与各州开展合作贯彻欧盟法的过程中的语言使用情况。
1999年	德国（以及奥地利）代表因抵制在芬兰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时非正式部长会议中只使用英语、法语和芬兰语，缺席会议，最后芬兰妥协。
1999年	时任联邦总理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Fritz Kurt Schröder）致函欧盟轮值主席国芬兰，明确表达了德国所构想的欧盟语言机制模式：在欧盟机构中实现三种工作语，确立英语、法语和德语作为平等工作语的地位。

从德国政府争取德语在欧盟内部地位的历程来看，统一后的德国政府就德语在欧盟内的地位问题作了不少努力，但也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策略，提出“工作语”这一务实的解决方案。这些努力在21世纪到来前得到了回报。1993年，欧洲委员会在发表的一份公报中明确规定：“如果文件是对外的，则以欧共体所有官方语递交……只要递交欧委会内部使用公文，应当以德语、英语和法语这些工作语言拟定”（转引自伍慧萍2003：36）。这一规定确定了德语在欧委会这一欧盟主要执行机构中享受除法语和英语以外其他语言无法比拟的地位（伍慧萍2003）。

进入21世纪后，德国仍在继续努力争取德语在欧盟中的语言地位，详情见第四章。

依托歌德学院加强国际传播

统一后的德国仍然将歌德学院作为对外传播德语的主要机构。随着德国将其对外文化政策重心转移到东欧国家，歌德学院也相应调整了战略部署，加大了对中东欧地区和独联体国家传播德语的力度，同时仍然坚持在

¹ 该项目延续至2000年时，参加德语语言课的欧盟官员有200人左右，参加单独授课的有30人。



欧洲其他地区、北美以及亚洲和拉丁美洲经济增长地区和中等发展国家进行德语传播（王志强、王爱珊 2014）。

进入 21 世纪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在德国对外文化政策的大框架下，以歌德学院为主力的德语对外传播战略力度更大，给德国带来经济、政治、教育等各方面的益处，具体内容见第五章。

2.2.2.5 统一后的外语教育

德国统一客观上要求整个德国的教育必须同步进行。统一后，新老联邦州文化教育部长组织了联邦各州文化教育部长联席会议，并于 1991 年签署了《霍因海姆备忘录》，力图在分离四十余年后共同制定统一的文化、教育和科学政策。新的联邦各州文化教育部长联席会议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工作重点是实施新教育体制改革，先后修订的《联邦德国州教育事业一体化协议修订稿》（又称《汉堡协议》）从不同侧面强调了继续坚持德国一直秉持的多语教育传统。

此外，汉语在这一时期也进入德国外语教育的视野。1993 年，北莱茵-维斯特法伦州在德国率先引入汉语教学，巴伐利亚州紧随其后，也在中小学开设了汉语课。2000 年以后，开设汉语课的学校数量增长速度加快。关于德国的国家外语教育，特别是近二十年来的国家外语教育的详细情况见第五章。

2.3 结语

本章简要介绍了 21 世纪以前德国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情况，并通过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¹划分为三个时期。

本章聚焦了第一时期德语语言的形成和发展。在历史上，德语地位尴尬，一度因受到其他欧洲语言和方言的压制而没有实现标准化。最终，德

1 两个时间节点分别是 1949 年和 1990 年。1949 年，东德和西德先后成立，自此，统一的德意志国家一分为二，世界舞台上出现了两个国家。1990 年，东德并入西德，两德统一。

语书面语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得到统一，德语的对外传播也由此开启。此外，德语还曾作为科学语言在世界上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虽然它最后和法语一样在与英语的竞争中失败而逐渐被英语取代，但这段历史仍然值得后人铭记和研究。

本章关注了第二时期东德与西德的语言政策。这一时期是德国历史上的特殊阶段，两个国家同宗同源，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却大相径庭，并在国际舞台上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它们在语言标准化、规范化和德语对外传播的问题上坚持各自的政策，但在正字法改革等方面也有合作。

第三时期是距今最近的一个阶段，统一后的德国经济发展迅速，国际地位提高，话语权进一步提升，欧盟成立后俨然成了欧盟领袖。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德国推行了更加积极的语言政策，特别体现为从政府层面更有力度地推动和推广正字法改革，争取德语在欧盟等国际组织中的地位。